

## 从“文明对话”到“文明星丛”

——以“亚洲命运共同体”系列国际讲座为例

王景枝\*

**摘要:** 文明本质上具有复数性质和对话主义特点。本文以中国传媒大学“亚洲命运共同体”系列国际讲座为例,阐释了从“文明对话”到“文明星丛”的基本价值理念。文明对话带领我们相识相知,跨越画地为牢的傲慢边界,并最终达到多元文明的共荣与共赢。文明对话的结果恰像多彩绽放的烟花,最终走向世界文明星丛的原生态本然面目。

**关键词:** 文明对话 文明星丛 亚洲命运共同体

“有不想大学毕业、永远读下去的同学吗?请举手!”

没有一位同学举手。

这是中国传媒大学“亚洲命运共同体”系列国际讲座<sup>①</sup>的一个画面,演讲人是“同一个亚洲”基金会首席研究员郑俊坤博士,他在用同学们熟悉的“毕业”来阐释“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毕业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通过各种选择,我们一生不断经历着“毕业”。对于国家而言也是如此,亚洲的下一次“毕业”将是走向“命运共同体”。

文明多样性是亚洲的一个典型特征,也是我们今天思考亚洲未来的重要背景。谈到文明,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文明冲突将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这种宿命论的文明观和视角带给世界的并非和平与安宁,反而激起更多的冲突和对抗,人类社会西方与非西方、中心与边缘的裂变与冲突似乎永无止境。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命运共同体”系列国际讲座如同一场场文明对话之旅,传

---

\* 王景枝,女,河南遂平人,比较教育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处副研究员。

达了从“文明对话”到“文明星丛”的基本理念，我们由此更好地相识相知，跨越画地为牢的傲慢边界，达到多元文明的共存与共荣，并最终回归世界文明星丛的原生态本然面目。

## 一 文明对话：认识自我

“自我存在于哪里？”“自我在出生时就有了吗？”<sup>②</sup>

“同一个亚洲”基金会主席佐藤洋治先生在演讲一开始就抛给同学们两个问题，大家意见不一。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集中为三个：大脑（brain），心（heart），身体（body）。佐藤先生说，“自我”（ego）一词其实是由“自己”（the self）和“我己”（the social self）两个方面组成的。婴儿出生时经由父母的命名获得名字，在 0 到 10 个月期间，通过外界几十万次的呼唤，逐渐转化成“自己”的概念。“我己”则以身份名称的形式存在。正因此，生日只是身体诞生的日子，并非自我诞生的日子。“自己”是全人类七十三亿分之一，而“人”才是那七十三亿的总称，和“自己”构成了一组相对的名词。通过严格区分“自己”和“人”的概念，佐藤先生指出了每个个体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本性。每个“自己”眼中的世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片面的世界，人类的自我和利己天性是阻碍世界和谐发展和一体化进程的最大障碍，也是民族、人种、国家等纷争的根源，它横亘在人类与世界合作与和解的中央。

利己本身无可厚非，只是纯粹利己带来的苦果让它戴上了原罪般的枷锁。从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必经的自我阶段。放眼世界的种种危机与困境，正是人类过度地以自我为中心，欲望肆意膨胀，导致“人类永无休止的种内战争和杀戮”。以各种生态危机为例，太多问题根本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各种利益主体为了自身的特殊利益而不惜牺牲和损害他人或后代利益，是人的逐利本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在生态环境上的表现。借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预言，佐藤先生也强调，“人类或早或迟会因世界全面核战争而自灭。克服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性，才是人类走向和平的钥匙”。当人类认识到自我的局限并开始思考跨越自我壁垒的方法，进而意识到人类的共同使命时，就有可能从自我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世界终将融为一体”，这是佐藤洋治对“人类将去何处”这一终极哲学命题的回答。

印度尼赫鲁大学海孟德（Hemant Adlakha）教授在演讲中引用圣雄甘地的话：“我们通过欧洲的眼睛认识我们自己，但我们不是要模仿西方的恶习而认识自我。”的确，我们常从别人的视野中认识并界定自我，文明对话的一个重大价值和意义也在于此。海孟德教授讲到，对于所有生活在亚洲土地上的人们而言，“亚洲”都是个外来词。“亚洲”是“亚细亚洲”的简称，起源于公元前 5 世纪的希腊，意为“东方日

出处”，后来被欧洲人用来描述位于欧洲以东的所有土地。对于“亚洲”这一局外人的命名，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也曾说过，“亚洲”的概念是西方的建构。“亚洲”一词经由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介绍到达东亚，但“亚细亚”“亚洲”等词的普遍流行与使用，花了两个多世纪。无论是文明还是经济，那时的亚洲都远比欧洲发达。欧洲人的侵略心与占有欲也日渐加剧，工业革命时期尤为如此。19世纪中期，尤其在鸦片战争后，当亚洲知识分子首先意识到欧洲对亚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威胁时，他们的泛亚洲主义（Pan-Asianism）意识便猛然觉醒了。呼吁亚洲团结与融合的呼声渐高，人们开始强调亚洲的历史传统和共性并进而努力创造“新”亚洲的身份。来自中国、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奥斯曼帝国等地的众多学者、政治家、艺术家都对泛亚洲主义思想做出过重大贡献。许多亚洲第一代民族主义思想家和领导人，如孙中山、冈苍天心和泰戈尔等都强调亚洲在国际社会的重要地位。

海孟德教授指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意义就是亚洲多元文明的历时共存。今天，“亚洲”已然把这块大陆的命运联结在了一起，借助本土文化和多元文明对话的推动，求同存异、团结协作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历史遗留的种种恩怨固然存在，但亚洲毕竟是亚洲人的亚洲，我们都有着和平、繁荣、富强的共同诉求与心声。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金素勇在演讲中讲到，要深化亚洲国家金融合作，以强化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并增强亚洲企业的融资能力。当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是亚洲的一部分，并为自己的亚洲人身份而骄傲时，亚洲就会成为一个命运相连的共同体。

## 二 文明对话：跨越傲慢的边界

人们常会在不知不觉中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文明和历史置于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央。许多希腊人相信历史始于荷马和柏拉图。许多西方国家更是相信，若非自己国家的非凡成就，全人类肯定还活在野蛮、毫无道德的状态里。以色列新锐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曾讲到，就连世俗的犹太人也相信，犹太人是人类历史的中心，是人类灵性和知识的根本源头，犹太教位列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他说，从幼儿园教育开始，犹太儿童就被教导犹太教是人类历史的“超级巨星”，“虽然完成了12年教育，但儿童常对全球历史演进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因为他们的课程里几乎不提中国、印度或非洲。”<sup>[1]</sup>司马迁笔下的中国历史从三皇五帝开始，我们祖先的世界观是“天圆地方”，在先民的观念中，“内中国而外四夷”，中国之外的地方都是“蛮夷”。周公旦营建洛邑，称其为“中土”，自认为就是天下的中心。周初的何尊铭文有“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义民’”之语<sup>[2]</sup>，这说明早在商末周初“中国”的概念就出现了。然此处言及的“中国”与今天所谓的“中国”有很大不同，上古所谓“中国”，实指后世的

“中原”。世界上许多宗教既倡言谦逊，又把自己塑造成宇宙主宰；一边要求为人谦和，一边却公然显示集体的傲慢。上述种种说法和行为，要么是故意无视历史，要么就是种族主义作祟。

我们的世界好像总有边界，不管是地图上鲜明的国界线，还是文化差异中的深深隔阂，横亘在心灵之间的界限总是那么难以逾越。日本大学副校长木村政司教授在名为“超越你的界限”的演讲中讲到，从太空远望地球，地球表面并无边界，非洲迁徙的鸟兽在寻找水源时也没有“边界”的概念。他演讲中展示的大雁展翅高飞的图片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鸟儿们随水草迁移，是真正跨越了边界的束缚，如此才能自由地翱翔。木村教授强调，地球上的各种“边界”都是人类傲慢思想的产物，“我真诚地渴望，我们能够超越自我和傲慢，从各种‘边界’的束缚中‘毕业’，用‘鸟’瞰的目光来观察世界。”从广告艺术设计跨越到科学、生物绘画领域，木村教授是名副其实的“跨界者”。他说，“自信 (confidence)、好奇心 (curiosity)、勇气 (courage)、一贯性 (consistency)、创造力 (creativity)”是自己一直秉持的五个“c”，是好奇心和使命感驱使他不断跨越自己的界限，探索新的领域。他惊奇地发现太多自己未曾接触的事物，痴迷于描绘微观的世界，也享受着不断突破和发现新事物的成就感。他视野中的艺术不只是一种传播媒介，它更像一个“情感互通”的纽带。艺术是没有国界的，我们要尝试用多元文化和艺术连接亚洲。对待中日文化艺术的差异，木村教授秉持包容、开放的态度，他直言任何界限都是我们心灵设置的屏障，当我们以共存共荣、交流互鉴的眼光来看待彼此，走出画地为牢的傲慢自我时，一切障碍都会消融。

“跨界”对于亚洲和世界同样重要。地球原本无国界，所有人为划定的各种界限都是人类傲慢的产物，文明对话的壁垒也由此而生。木村教授在结语中进一步强调，单个的国家和地区均处于零维的点状，零散而不堪一击；当所有国家和地区跨越障碍紧紧连接之时，就会出现和合圆融而又强大的二维圆形。在我们学会以高维的视角看待众多问题时，世界将变得简明而清晰。地球 40 亿年的生物进化史为人类留下了无限的学习源泉，我们目前亟须跨越各种傲慢的边界，以更加宽广的胸怀和高维的视角俯瞰万物和谐共处的地球，而人类社会理应发挥自己巨大的创造力和凝聚力。

### 三 文明对话：共存、共荣与共赢

“汉字肇于自然，是东方智慧结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常耀华教授从汉字的美和智慧切入，揭示出汉字视觉传达艺术饱含的“和合”理念与价值。世界四大古文字中，唯有“囊括万殊，裁成一相”的汉字从创制至今，依然灿烂辉煌，汉字可谓时间打不败的文字。汉字有对称之美，对称即平衡，平衡即和谐。《新甲骨文编》收字 3592 个，其中整体上的对称字就多达 904 个；若计入局部对称字，数量则更

大。大千世界中对称美无处不在，汉字体现了中华文明追求平衡和谐的基因，显示出中华文明对自然与人的关怀和“天人合一”观念。以形表意、寓意于形是汉字的造字方法，大自然的飞禽走兽、高山流水都融于汉字符号之中。汉字还美在动感，有鼓侧之美，危不至失，险不至崩，像一场独特的字体构型“杂技”；汉字也美在繁缛和简约，可谓“淡妆浓抹总相宜”；汉字更美在其“写意”，这也是中国文化艺术的精髓。

常耀华教授由汉字谈到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性格。他形象地称西方文化为“山文化”“虎文化”，刚硬雄强，勇于探险，敢于创造；中国则是“水文化”“象文化”。大象身形硕大，看起来吓人，其实温顺和善；水利万物而不争，以柔克刚、滴水穿石，揖让和合是中国人的品格特征。儒家贵“和”尚“中”，“和合”与“中庸”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维，表达出互相尊重、共赢共生的人际交往原则。“和而不同”“和衷共济”显示了和谐共存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教育更是扎根和平，国人所特有的一项人格特征就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与杀戮。这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虎文化”“山文化”极力寻求扩张、追求刺激和冒险的本性有着明显的差异。过去20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连打过多场对外战争的国家。“9·11”事件之后，美国开始了“反恐战争”，变得比以往更加强硬，也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于重树自己的霸主形象。但是，美国是个阶梯形社会，国人天生具有“攀登上进”的精神。他们否定命运，否定社会地位是上帝安排的。他们务实、信奉个人责任和努力，但也铁血、富有蛮性、尚武善战，奉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美国今日的富强和发达与这种“虎文化”“山文化”密不可分。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看重差异，认为“不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国语·郑语》记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以他平他”，相异的事物相聚合可互补互济、“和实生物”；“以同裨同”，相同的事物相聚叠加，结果只能是相互窒息、“同则不继”。若全球呈现“虎文化”“山文化”一枝独秀，那结局只有一个，大家终将同归于尽；反之，“象文化”“水文化”如果成为遍地开花的普世文化，社会发展难免少了锐气和活力，进而延缓世界前进的脚步。

人类社会始终是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遇相知而迸发的动力中探寻前路，文明多样性本就是世界文明的“原生态”。仅就教育而言，美国“虎文化”“山文化”下的教育一贯重视体育，体育的目的不仅是锻炼身体，而且在于培养孩子的勇武、竞争欲望和求胜的决心。但中国“象文化”“水文化”下的教育从不提倡尚武精神，文质彬彬、温文尔雅是中国人崇尚的文化特质。早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在访美之时，因深感中国教育把孩子们训练得过于文绉绉，于是撰文呼吁社会让孩子“蛮一点儿”。<sup>[3]</sup>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孩子们似乎仍未“蛮”起来。旅美学者薛涌教授也因此再次呼吁：“孩子，蛮一点！”<sup>[4]</sup>如今看来，“象文化”“水文化”与

“虎文化”“山文化”下的教育恰如理想育人精神的最重要两极：前者使人温和柔顺，后者使人坚忍不拔。仅仅有前者，人难免儒雅而柔弱，而只有后者，人又会过于强劲而粗野。二者互补以至平衡，方可文而不弱、武而不暴。

每一种文明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异质文明的矛盾客观存在，但无须你死我活。给彼此留下生存的空间，共存、共荣的双赢局面才会出现。研究人员在对一些老年和意外死亡者做医学解剖时发现，很多人身体里早已出现了癌变细胞，但绝大多数人不会因癌而死亡。再以“全球公害”蚊子为例，据说科学家几年前就基本掌握了通过基因编辑和绝育使蚊子灭绝的办法，但他们并未轻易那样做。因为科学家们早已意识到自然生态平衡的微妙和人类的渺小，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是有限的。这些都从另一面启示我们：战胜“敌人”并非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若能控制其活性，共存、共赢是一条可行之道。同理，“反恐战争”中极力“寻找和消灭恐怖分子”的做法是无意义的。

按照彼得·伯克 (Peter Burke) 在《文化杂交》中的一个观点，任何所谓“民族”文化其实都是杂交的产物。每种文化都有其稳定性和延续性，但绝非亘古不变，试图“纯化”某一文化，实质上都隐含着原生主义理论预设。因此，强行植入所谓的“高级文明”并力图消灭异质文明，既不必要也无道理，其结果只会是“水土不服”，或因冒犯而激起更强烈的反抗。文明类似夜空中颗颗闪烁的星辰，它们共同汇聚成世界文明的璀璨星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直至世界大同。

### 结语：文明的星丛

“亚洲命运共同体”系列国际讲座为青年学子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广阔世界和文明多样性的机会与平台。笔者作为该项目负责人，在连续两年的项目运行过程中，深深感受到同学们对这一课程的热情和他们丰厚的学习收获。在一门课程中能听到来自全球不同领域教授的讲座，有利于学生开阔视野，以更积极、开放、包容的心态认识亚洲、了解世界，提升全球素养和跨文化理解能力。

汤因比对人类文明做出过这样的判断：所有文明都具有“同时代性”和“可比较性”。<sup>[5]</sup>这意味着文明本就是“复数”的存在，因为多样性和差异是进行比较的前提。这一文明观也从本质上彰显了文明的对话性特点。借用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星丛”的概念，文明对话的结果恰像多彩绽放的烟花，它们不再是一个个孤独的个体存在，而是群体的丛生共荣，由此以他平他、和实生物的共荣、共赢理想得以实现。作为一个形象的比喻，星丛意味着一群并列的而非整合的变化元素，如同天文学星座一样，每个星座内的星星都和平共处，不存在等级性和同一性，它们共同形成了星座的图像。<sup>[6]</sup>在文明的星丛中，不同与差异获得平等与尊重，异质文明在相互抵触与批判后又相互建构与融合，最终不断走向非同一性的“文明的星丛”，这理应是文明对话的最终归宿。

## 注释

- ① 中国传媒大学系列国际讲座项目由日本非政府公益组织“同一个亚洲”基金会资助开设，2020年4月1日起，该组织更名为“欧亚基金会”。
- ② 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用主要来自讲座项目聘请的演讲人，在此对他们的精彩分享表示感谢。

## 参考文献

- [1]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第171页。
- [2] 何振鹏 《何尊铭文中的“中国”》，《文博》2011年第6期，第32~34页。
- [3] 费孝通 《美国人的性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24页。
- [4] 薛涌 《谁的大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第185页。
- [5] 〔英〕阿诺德·汤因比 《历史研究》（上卷），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第10页。
- [6] 吴静 《德勒兹的“块茎”与阿多诺的“星丛”概念之比较》，《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第49~56页。

## Civilization Dialogue and Civilization Constellation: Based on the Serial International Lectures of Asian Community i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Wang Jingzhi

**Abstract:** Civilization is plural and dialogic in essence. Taking the serial international lectures of Asian Community i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CUC)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basic values from civilization dialogue to civilization constellation. The dialogue between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leads us to know each other, cross the arrogant boundary of one's own trap, and ultimately achiev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global inter-civilization. Like colorful fireworks, civilization dialogue will finally lead us back to the original nature of the civilization constellations.

**Keywords:** Dialogues of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Civilization Constellation; Asian Community